

重庆三峡库区“三线建设”时期的移民及文化研究

何 瑛, 邓 晓

(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 重庆 400047)

摘 要: 从1964年到1980年期间,在中国中西部地区进行了一场被称为“三线建设”的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其决策之快,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影响之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上史无前例。如今占据了三峡库区绝大部分地域的重庆曾是“三线建设”的重镇,有来自全国不少地区的数十万政策性移民。他们的迁移背景、迁移过程、迁移结果乃至移民文化便是本文讨论的对象。

关键词: 三线建设; 移民; 重庆文化; 三峡库区

中图分类号: K 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6219(2012)03-0039-06

从1964年到1980年期间,在中国中西部除新疆、西藏之外地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简称“三线建设”。它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投入总资金2052亿元,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其决策之快,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共和国建设史上史无前例。重庆是“三线建设”的重头戏,占了如今三峡库区的绝大部分,在这场特殊的基本建设活动中,政策性移民近50万人。

一、“三线建设”带来的工厂及人口的内迁

讨论三线建设的起因,是本文得以展开的前提。它不仅与当时的国际、国内大环境相关,更与当时中央政府因此而做出的决策相系。

所谓“三线”分别指:一线,位于沿海和边疆的前线地区;二线,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及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后方地区,共13个省区;三线,指介于一、二线之间的中间地带。“三线”之分,实为是当时中央政府以战略的目光审视我国工业布局的结果。实际上,三线地区就是除新疆、西藏之外的中国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三线”之中,川、贵、云和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一、二线的腹地俗称小三线。

对在全国范围内大兴三线建设的背景及过程,陈

东林在《三线建设始末》一文中分别从“吃穿用”计划设想的形成、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提出、以战备为中心的“三五”计划三个方面做了较详细的探讨。我们注意到文中对“三五”计划指导思想转变的陈述:“1966年开始的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简称‘三五’计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史上的一个有特殊意义的计划。一方面,它的制定和执行,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53年开始的按五年计划进行的经济建设,在六十年代初期由于出现严重经济困难局面被迫中断三年后,又重新走上了正轨。另一方面,在制订过程中,‘三五’计划指导思想经历了由‘解决吃穿用’到‘加强战备’的变化,标志着中国经济建设实行了一个重大战略转变,其所奠立的指导方针一直影响到七十年代的‘四五’、‘五五’计划。”^[1]

六十年代初期原本以“解决吃穿用”为目的的“三五”计划,何以转变为以“加强战备”为主旨的呢?据当时高层思路,主要原因大抵有二:一是国际环境局部恶化,二是我国工业布局失衡。细分下来,前者表现为:美国在越南的侵略战争逐步升级;苏联在邻近中国边境驻军增加到近百万人;台湾政权宣传反攻大陆;中印边境局势尚未缓和。后者则体现在:我国工业过于集中(十四个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我国大城市人口多,且多在沿海地区;我国主要铁路枢

收稿日期:2012-02-28

基金项目:重庆市2008年社科规划重大项目“三峡移民史”(CQZDZ11)。

作者简介:何 瑛,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邓 晓,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

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中城市附近;我国所有水库紧急泄水能力不足。国际国内前后两者间的关系被认为十分紧密,因为如果战争爆发,我国的工业或将面临灭顶之灾。于是便有了在中国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开展“三线建设”,以平衡工业布局、准备应对战争的动议。

1964年5-6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决定集中力量进行大三线建设。同年8月,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任组长的国务院专案小组成立并提出了三线建设的初步部署意见。9月21日,李富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宣布“三线建设的目标,是要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2]1965年初,以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为首“小计委”成立,后又主持国家计委工作,着手“三五”计划的编制、修订。9月14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报送《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提出:必须立足于战争、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提出“三五”期间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850亿元,计划施工大中型项目2000个左右的设想。1965年9月至10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了《汇报提纲》。但由于次年“文化大革命”开展,该《提纲》未能形成正式批准的“三五”计划。但以后几个年度计划都是据该方针安排的。

1966年,“三五”计划《汇报提纲》开始执行,但实际上许多国防建设和三线建设项目从1964年底就已动工。“从1964年到1965年,在西北、西南三线部署的新建、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达到300余项。”^[1]进入七十年代,国家继续加大三线投资,在1970年全国计划会议要求“坚决贯彻林副主席的指示,以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是年,计划用于大三线的建设投资和大型建设项目均占全国计划内投资和大型项目的一半以上,三线地区国防科技工业的投资比“三五”计划期间的年均投资增加了48%。1971年“林彪事件”后,周恩来主持两年经济调整。1973年中共中央两次修改“四五”计划的高指标,逐步调整以战备为中心的战略,开始强调经济效益,注意沿海和三线地区发展并重,大规模的三线建设随之进入收尾阶段。李宗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一书中认为,三线建设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开始起步阶段(1964年8月至“文革”开始),缓慢进展阶段(“文革”开始至1969年底),全面建设阶段(1970-1972),调整和转向正常阶段(1973年后)^[3]。

“三线建设的方式,一是投资新建,二是内迁沿海地区老企业,并以搬迁为基础,加以补充和扩建。三

线建设是我国沿海地区工业生产能力向腹地的一次大迁移,也是我国较先进的工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向落后地区的传播和扩散。”^[4]中央政府对三线建设先后投入2000多亿元资金,其中工业投资占70%以上。

三线建设的成效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客观上缩小了东西差距,推动了中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缩小了东西部地区经济水平的差距,打下了今天西部大开发的基础。例如:在交通运输方面,从1965年起相继建成川黔、贵昆、成昆、湘黔、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十条干线及若干支线、专线,占全国同期新增里程的55%。就基础工业而言,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的汽车年产量已占当时全国的三分之一;重庆钢铁公司、重庆特殊钢厂、长城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形成了钢铁基地。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西昌也变成了钢城、煤都、汽车城、镍都、航天城。

三线建设的成效与三线人口迁移的数量是成正比的。“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工业固定资产由292亿元增加到1543亿元,增长4.28倍,约占当时全国的1/3。职工人数由325.65万增加到1129.5万,工业总产值由258亿元增加到1270亿元,增长3.92倍。到1978年,中西部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40.28%,比重达到了建国52年来的最高峰。”^[5]我们十分关注由上述这些大型项目所带来的人口迁移潮,就建设内容本身而言,主要有三方面内涵:一是工业设施的新建,二是工厂的迁建,三是工厂的扩建;前两者都必然造成了人员的大量流动,前者的主体是专家和高级技术人员,后者还包括大量的熟练工人,他们成了大、小三线地区的新移民。这是一次较大规模的政策性人口迁移,其具有政策性强、保密性强、组织度高、人数多、分布面广、时间长久等显著特征。

“三线建设”有力地促进了内陆工业之发展,相当程度上平衡了我国工业布局,为今天西部的大开发奠定了基础。储成仿归纳三线建设的得失如下,成就方面:第一,建成了一批重要工业企业;第二,形成了若干新的工业中心;第三,更新了三线地区的工业面貌。失误方面:第一,建设计划不当和不配套;第二,建设程序混乱和选址失误;第三,外部环境差和生产成本高;第四,片面强调生产而忽视生活福利^[6]。就宏观而言,对战争爆发可能性的过高估计,出于“备战备荒”的目的,改变了抓“吃穿用”的初衷,使民众又过了几年紧日子;由于部分项目过于偏僻和分散,为企业后来的经营发展带来巨大不便和浪费,个别投资巨额的项目甚至在正式投产之前便夭折了,教训也是不小的。

二、重庆的“三线建设”及其人口迁移

重庆是西部的重心,“三线建设结束后,重庆及周边地区得以借助国防工业建设,拥有了一大批新建、迁建和扩建企业,拥有了一大批与之配套的科技研发机构,从而得以实现兵器工业、民用机械工业、医药工业、化学工业、仪器仪表工业全面开花,形成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现代工业格局。”^[7]

对选择四川重庆为三线建设重地的原因,原重庆市“发改委”副主任马述林谈到五个方面:其一,当时四川人口多,地域广,物产富,自然条件好;其二,重庆的兵器工业基础雄厚;其三,重庆有重钢、特钢两个大的钢铁工业基地;其四,重庆的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布局合理、交通方便;第五,重庆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和当时西南最大的火电厂^[8]。“由于历史的积累,重庆有较强的军事工业基础,三线建设中就以重庆为中心大量发展兵器工业,致使重庆的兵器工业不仅在全川、西南,而且在全国都占有突出的地位。”^[9]

重庆三线建设的规划与实施是有序的。1964年9月中旬,“重庆地区三线建设规划小组”成立,小组“根据中共中央和全国计划会议提出的‘以重庆地区为中心,用三年或稍长一些时间建立起一个能生产常规武器,并且有相应的原材料和必要的机械制造工业的工业基地’,以及在机械工业方面‘以重庆为中心逐步建立起西南的机床、汽车、仪表,和直接为国防服务的动力机械工业’等指示精神”^[10],编制出了《重庆地区三线建设规划》。该《规划》提出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工业布局项目:“提出以重庆为中心迁建、新建的项目有212个;计划从上海地区迁入122个;从广州、南京迁入20个;从东北地区迁入27个;从华北地区迁入43个。”^[11]上述项目中,仅重庆地区的投资即高达42亿元。1965年2月,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成立,由李井泉任主任,负责指挥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同年12月30日,中共重庆市委决定成立国防工业领导小组。

据载,从1966-1976年间(即“三五”、“四五”期间)“……本市全民所有制基建投资总额达38.12亿元,超过了前16年的总和。其中以重工业为主,占82.6%,部署了一批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到本时期末止,机械、冶金、化工、纺织和食品工业已成为本市五大支柱产业,其他工业门类也基本齐全。”^[12]其间的投资总额为:“三五”时期为17.7个亿,“四五”时期为20.5个亿,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三五”时期为10.4个亿,“四五”时期为12.5个亿^[13]。

重庆三线建设的组织方式也是有度的。它做到了在领导、组织及物资三方面的有效保证:首先,建立了上自中央,下至地方的领导指挥体系;其次,重大项目的指挥部体制,指挥部由建设、施工、设计及物资等部门与地方党委联合组成,由建设或施工单位一把手任指挥长;第三,由中央物资部在西南设立三线物资指挥部,在重庆、成都、自贡等处设立直属地区物资局。从而使三线建设实现了领导有力、调遣有度、突破界限、项目落实的高效。重庆三线建设的迁建历程大抵如下:1965年1月23日,由上海动力机制造厂全迁来渝新建的浦陵机器厂投产,“该厂是三线建设内迁重庆最早的企业。”^[14]

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重庆地区三线建设经历了高潮、基本停顿和收尾续建三个阶段:高潮期(1964年下半年到1967年上半年),基本建成50多个兵器工业企业事业单位。其间,从1964年至1965年底,“从北京、上海、辽宁等12个省市迁入重庆地区的企事业单位达60个……1965年内重庆地区在建的三线重点建设项目107个,投资2.5亿元,其中在重庆的项目53个,投资1.7亿。”^[15]停顿期(1967年底至1969年底),由于文化大革命暴发,重庆乃至整个四川的三线建设基本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三线建设兵器工业指挥部也不复存在。收尾期(1970年初至1980年前后),三线建设继续进行但以收尾、配套为主。其间,“1970年1月,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党委决定,成立四川省三线建设领导小组重庆分组……分设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后勤组、规划组,负责重庆市及周围5个专区的三线建设工作。”^[16]

“1965-1975年10年的时间,国家共把200亿元投入在‘三线’地区国防工业和科研基本建设上,先后建成了42个研究院(所)297个工厂,形成了超过100亿元的生产能力。”^[17]其中,相当大的部分就建在了重庆。因此,重庆三线建设成就也是明显的:通过“三线”建设,重庆建立了门类较为齐备的以常规兵器制造为主,电子、造船、航天、核工业等相结合的国防工业生产体系:一是兵器工业的改扩建。除扩建了原有7个老厂,还新建了红山、庆岩等14个机械厂和两个研究所。至1980年,“三线”新建企业加上原有兵工厂,重庆地区拥有38个军工企业和科研院所,固定资产原值达18亿元。二是船舶、电子、航天工业项目的建设。从1965年到20世纪80年代,相继建成了较为完整配套的船舶工业基地;电子和航天工业方面,形成了有30多个电子工业项目为依托的基地。三是冶金、化工、机械工业项目的配套建设。如对重钢、特钢、天原、长化、矿机、起重机厂的改扩建,对西铝、川

维、重氮、川仪等企业的新建。四是对交通项目的建设。主要有川黔、襄渝铁路的修建,嘉陵江大桥、涪江大桥、北碚朝阳桥的兴建,以及各港口、码头、机场的新建和改扩建^[17]。

重庆三线建设的体量也是空前的:在仪表工业领域“1965年贯彻中央调整工业布局,加速三线建设方针,经国家批准在重庆建设西南电子仪器仪表工业基地,重点筹建四川仪表总厂(1967-1975年曾用名四川热工仪表总厂),下属22个专业分厂,陆续由上海、北京等地内迁于北碚、巴县、璧山、江北、南岸等地建成投产。”^[15]在机械工业领域,三线建设期间“共建成企事业单位65个,其中内迁企事业单位达41个。”^[18]在科研领域,1964年后“国家科委和机械、电子、交通、煤炭、医药、兵器等部门先后将华东和华北地区一部分技术力量较强、仪器设备较好、规模较大的科学研究机构迁到重庆,到70年代,建成14个部属科研院所,成为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坚力量。”^[19]此外,1965年以来重庆市组织力量对抗战期间遗留下来的防空工事进行整修,“组织大、中型企业改建、扩建生产洞279个,面积共计5.65万平方米,将3684台(套)设备转入洞内生产。”^[20]据统计,安排在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项目有118个工厂企业及科研单位,其中:“江北区9个,沙坪坝区15个,九龙坡区8个,南岸区3个,北碚区25个,南桐矿区5个,大渡口2个,双桥区2个,巴县9个,綦江县8个,长寿县5个,江北县6个,江津县8个,永川县7个,合川县2个,荣昌县2个,璧山县1个,铜梁县1个。”^[15]该数据尚未包括直辖后纳入重庆市的万州、涪陵等地。在《涪陵港史》中,我们读到了下面文字:“涪陵物产丰富,交通方便,地势险要,利于战备,是三线建设的理想之地,中央有关部门在涪陵地区迁建、新建工矿企业日益增多。第六机械工业部和第八机械工业部两个系统,在涪陵地区的长江、乌江沿岸就安排了十几个建厂项目,到1968年,两部在涪陵地区建成和在建项目达19个。”^[21]

据不完全统计,到重庆的“三线建设”政策性人口迁移前后约达50万人。其人口迁移活动为有组织、有计划、分批次进行,有的是整体搬迁,有的为部分搬迁。例如,1965年初国家建筑工程部在渝设立了“第二工程局”,“1965年2月原建工部渤海工程局局长李景昭亲自带领首批职工从辽宁乘专列火车来重庆,随带主要机械设备、装载64个车皮。”“截至1965年6月从外地进入重庆的基建施工队伍就有26904人。”^[15]而“纪念重庆川仪九厂内迁四十周年”一文,则十分生动地再现了搬迁时的场景,“一九六九年五

月底六月初,二百多名第一批内迁和随迁人员名单张榜公布了。……随后,一道硬命令下达:凡内迁人员必须在六月二十日前将家具行李整理好,由南分厂负责统一打包随船托运。……第一批内迁人员包括家属大约有六七百人,由南分厂包了一条东方红63号轮,在军管会的一位副职干部带领下,于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开往二千多公里外的祖国大西南山城重庆。……两年后的一九七一年,第二批内迁人员100多人也抵达山城。前后两批内迁和随迁人员共有300多人,加上职工子女一共有近千人来重庆安家落户。”

“三线建设”期间,重庆迁建、新建了200多项大中型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使当地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一跃而居全国第五位。而这200多项大中型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又带来了为数约50万的政策性人口迁移的移民。同时,在三线建设过程中,重庆也向攀枝花、泸州、成都、自贡、绵阳输送了不少的技术力量与熟练工人。在《重庆市机械工业志》中,我们读到了1966年四川省机械厅发出的通知:“自贡空压机厂由重庆水轮机厂空压机车间的设备及人员全部搬迁并负责包建;资中矿山机械厂由重庆通用机械厂负责包建;……乐山通用机械厂由重庆二机校、重庆电机厂支援;先锋机床附件厂由重庆二机校支援。”^[22]

三、“三线建设”移民的守与留

重庆三线建设导致的人口迁移,其移民的再次迁,是随20世纪八十年代“调整”的开展进行的,这与当时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上世纪70年代末,国际形势由过去的对抗转为了对话,进入了和平发展的时代;我国也抓住大好时机,开始了改革开放。

但以军工为主体的重庆三线建设企事业,此时却跌入低谷。除产品订货量大幅度减少外,前阶段军事项目的盲目上马和片面强调“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也给她带来了不便和浪费,一些单位更因地处交通闭塞的深山而陷入困境。于是,国家开始了规划项目的调整和搬迁。1983年3月重庆开始三线调整工作,成立了由崔连胜任主任的“重庆市三线建设调整改革规划办公室”(简称三线办),采取新建、迁建、迁并、并入等方式,对原三线建设单位进行调整和改造。三线办最初由市政府直管,后又隶属市计委,于1997年成立直辖市后撤销。

三线调整改造,重点针对建设不成功、未建成、有隐患险情的部分单位,采取关、停、并、转、迁、换等措施,进行资产存量和生产力布局的调整。其进程大抵

如下:“首先批准的调整搬迁项目 29 个,其中 16 个项目在 1990 年前实施,例如原建在广安的华光仪器厂迁入了北碚歇马乡,明光仪器厂迁入了南岸经济技术开发区……”^[15]。从 1986 年至 2005 年,重庆市 45 个三线调迁项目,批准总投资 49 亿元,实际投资 54 亿元,基本上完成了国家批准的调迁改造任务。其中,有 37 个军工企事业单位留在了重庆,6 家迁往成都。调改工作作为三线企业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条件,同时又是重庆境内外人口的一次小规模迁移。

文章“‘三线’构架重庆现代工业”^[8],对当时的局面作了简要的回顾与介绍:1979 年,从长沙军品预定座谈会传出消息,次年的军品订货仅达 1979 年的 1/3,该数字震惊了兵工行业。生产任务锐减,企业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单一的产品生产,使工厂顿时陷入了生存危机。要知道,“到 1975 年,西南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器基地产量已经占全国的一半左右。”^[23]这迫使重庆的三线企业分别作了转向、重组、搬迁的选择,它们纷纷从山沟里走了出来,贴近城市,贴近市场,以军转民的生产寻求新生。

转向过程是痛苦的。平山机械厂全凭自己的力量“开始时做风扇,还有波纹铣刀、印刷机、双色印刷机,紧接着是开发汽车和摩托车。”青江机械厂由于技术、设备较落后,给嘉陵摩托车生产的锻件,曾因价格太贵而被淘汰。重庆铸钢厂开发民品,几年时间做了几千个品种,都形不成批量,养不活全厂工人。依靠同行力量的重组,效果较好,但难度也不小。例如重庆大江工业集团,其重组过程从 1984 年计划起历时 16 年,涉及单位有綦江双溪机器厂、南川红山机械厂、庆岩机械厂、红泉仪表厂、万盛渝州齿轮厂、147 厂、綦江庆江机器厂、万盛平山机械厂、江津青江机械厂和重庆铸钢厂等企业,到 2000 年才最终完成,是全国最大的三线合并搬迁企业。

位于主城边缘的长安、重钢、嘉陵、建设、西铝等大型三线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则较早走出困境,靓丽转身,并逐步发展为重庆工业的龙头企业。嘉陵机器厂(451 厂)于 1980 年 9 月成立了嘉陵牌摩托车经销联合体(由 451 厂、浦陵机器厂、6905 厂、5007 厂、南川机械厂共建)。重庆造船厂(429 厂)于 1984 年 5 月承接了川东、川南 86 艘船舶建造任务,9 月制造成功 717-11 型侧壁式民用气垫船(岷江号);同年 6 月,重庆-雅马哈 CY80 型摩托车在建设机床厂(296 厂)正式投产;11 月长安牌 SC110 型微型汽车在长安机器厂(456 厂)首批出车,次年 11 月该厂成为微型汽车定点生产厂^[10]。一些地处深山的大型三线企业,也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克服了转向改制的困难,走上良性发展

的道路:例如,前身为军用核企业(816 工程)的涪陵建峰化工总厂,1984 年工程停建转产化肥,从 1920 万元的“吃饭钱”起步,实施生产自救。到 2003 年该厂已“设 15 个生产经营性分厂(公司)、1 个乙级设计院、3 个控股子公司……形成以大化肥为龙头,以发供电、电解铝、净水器、聚丙烯酸脂橡胶、水陆运输等为辅的多品种、多行业的经营格局。”^[24]2005 年,该公司又通过资产重组、借壳上市,走上了外延扩张之路。与此同时,对规模宏大的“816 工程”弃洞,则开发成了以“核”为主题的国防科普教育基地。又如,长寿区的重庆长风化工厂,曾因产品单一、巨额负债,从 20 世纪八十年代末起,经历了连续十五年的亏损。继后,该厂引入清洁生产及循环经济的化工集成创新模式和先进的柔性生产模式,于 2005 年扭亏为盈,全厂实现产值近 3 亿元,利税达 1000 万元。

三线调整对重庆地区经济的发展作用显著。首先,20 多家国防企业和研究所迁入市区和近郊,形成了新的经济格局即:南坪电子仪器仪表工业区;巴南渔洞汽车及重型机械加工工业区;江北冉家坝精密机械电气仪表工业区;石桥铺科研区。在该四区的基础上形成了重庆上世纪 90 年代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及本世纪初的北部新区。其次,这次调整注意企业搬迁建设与技术改造的结合,有力地推动了重庆市以机械制造为主的汽摩、以天然气为主的化工、以钢铁和铝材为主的冶金等支柱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再次,迁建、调整的重要企业大大带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调整改造的经历犹如凤凰涅槃。它迫使重庆的大多三线企业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阵痛,并最终赢得了漂亮的转身。当然,也有少量三线企业在调迁中没落。例如位于南坪的 338 厂和调迁成都的 268 厂就因经营不善、资不抵债实施破产,338 厂被建设集团兼并等。

四、“三线建设”移民的文化形态

“三线建设”时期,大约 50 万优秀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员、大批的熟练技工来到重庆(加上部分随迁家属,移民的总量可能还要大)。他们除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还带来了颇具特色的移民文化。该文化不但具有时代特征,也带着浓厚的家乡色彩。

对该文化的时代特征,我们能从“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好人好马进山来”、“先生产后生活”、“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等豪言壮志中深切地感受到。三线人是无私的奉献者

和辛勤的创造者,在历经 40 余年的岁月后,这些当初二三十岁的热血青年,都已两鬓染霜。而他们的子女则正在接过父母手中的班继续为第二故乡的经济建设努力。他们的精神、他们的壮志以及他们可歌可泣的故事构成了那个时代英雄主义的主旋律。而该文化中浓厚家乡色彩的保存,则与移民们所处的特殊生存环境相关。三线企业多散布在偏远山区及河谷地带,一呆就是 20 多年,每个企业都俨然一个小社会,从医院、学校到工厂、农贸市场一应俱全,封闭的环境使他们信息不灵,远离城市造成了其人文环境的退化。两地分居、子女教育、就业、婚姻曾是他们难以跨过的坎,作为漂泊异乡的普通人,他们的爱恨情仇以及他们与当地民众千丝万缕的关系,也都成了“三线”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内容,给崇高与激昂抹上了些许悲壮与无奈的色彩。

由于三线人奉献精神的伟大,也由于三线建设历史的重要,也就有了许多关于三线文化的作品。1965 年 10 月、11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先后视察了位于重庆的兵工厂“四五六厂”、“二五六厂”,薄一波在《一次重大的经济战略调整》一文中提出了:我很赞成给为“三献人”(献青春、献终身、献子孙)谱写颂歌的倡议,这代表了党和政府对三线人的肯定。

三线移民的文化以其真实、深刻而动人。刘常琮以三线人后代的身份讲述了自己随父母从泸州迁往重庆市南川境内的国营东方红机械厂(现为成都天兴仪表有限公司)的经历,她说“我的第二故乡天星沟,地处黔渝交界的重庆市南川境内、海拔 2251 米高的金佛山脚下……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天星沟度过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美好时光,不会忘记天星沟美丽的自然风景,我也永远不会忘记闭塞的环境给我们带来的困惑和艰难,咆哮的山洪带给我们的恐慌和悲伤。”但她坚信“三线人对人民、对祖国、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精神,三线人‘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奉献精神,三线人‘艰苦创业、吃苦耐劳、团结奋斗、勇于创新’的拼搏精神,都将作为宝贵精神财富传承于世。”^[25]

2006 年 4 月 11 日晚,纪念重庆船舶工业“三线”建设 40 周年巡回演出在涪陵区委大礼堂隆重举行。川东造船厂秦培良厂长在演出前致辞:“四十年前,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建设者们来到涪陵瓦窑沱畔,回首前辈们的艰苦创业史,我们没有理由不搞好我们的家园、我们的工厂。”在随后的文艺演出中,人们则以舞蹈《日出长江》、配乐诗朗诵《我自豪 我是川船人》等,展示了川船人扎根瓦窑沱畔的“三线”建设、军转民和

移民搬迁经历。他们时刻牢记着自己的历史。

曾历任国营第七八九厂工程师、常务副厂长、总经济师,四川省重庆市电子工业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重庆市信息产业局局长、党组书记的贾秦英,在其自传体小说《悠悠岁月》中记下了自己参加“三线”建设的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它是一本散文集,一本人生的回忆录,更是共和国一段历史的记忆。该书已于 2007 年 8 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青红》是一部反映上海人支援三线建设的电影,重庆作为宣传的第 9 站,2005 年 6 月 9 日剧组成员抵渝,受到观众的热捧。“短短的一天,《青红》剧组就到参加了重庆 4 个活动。……一位曾经从上海支援重庆三线建设的女士很激动地用上海话对王小帅导演表示‘阿拉上海人!’王小帅立刻眼放光芒,对这位老乡关怀有加‘你回过上海吗?’这位女士表示‘我十几年前回去过,但是现在一直待在重庆。’”^[26]在重庆北碚的缙云山下,至今还有一个名叫“沪渝村”的社区。

“重庆标准件厂”1967 年从上海迁建于沙坪坝区的中梁山,大部分为举家搬迁,有 500 多人,他们集中居住的 5 栋楼房被当地人称为“上海村”。随时代的变迁,如今上海村里的原住民已不足百户,“仍留在‘村’里的,大多是当年的第一代,这些已不再年轻的‘阿拉人’因语言、习惯以及气候差异,生活圈子越来越小。”但他们的第二代,则有不少与当地人结婚,搬了出去,成了能操“双语”的本地人。也有人选择了回沪,“按国家有关政策,他们回去,要么投亲靠友,要么在上海还有房产。还有,就是等孩子长大去上海读书、工作,父母跟着过去。”^[27]

三线建设人口迁移所形成的移民文化,其形态是相对稳定的。究其原因,一是他们由发达地区内迁,自身文化相对成熟进步。二是他们整体迁居,原班人马异地作业,拥有源文化传承的相对稳定空间;三是当时高度的国防保密要求,他们及其所从事的事业基本与外界隔离。以上因素使从事三线建设的移民们较少受到迁徙地文化的影响。这种状况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打破。改革开放后,三线建设者中的一部分按要求回迁了,更多的则融入当地经济与社会,于是自身文化的改变在所难免。但总体说来,受影响的以第二代较多,第一代相对较小。

参考文献:

- [1] 陈东林. 三线建设始末[J]. 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7(2).
- [2] 杨超. 当代中国的四川(上)[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0: 135. (下转第 57 页)

明其他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如汤显祖的戏曲《牡丹亭》所表现的“真情至性”一样,都具有近代人文主义的色彩,是晚明社会时代变迁的缩影和进步思想的代表。

总而言之,上述四朵爱情之花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明代的社会生活。“怒沉”以“真诚”的丧失反映现实生活的黑暗和残酷无情,是一朵充满悲愤的花。“独占”以“真诚”的获得赞美新生的市民道德,是一朵洋溢幸福的花。“落难”通过苦难的历程抨击黑暗势力的罪恶,同时又对封建清官寄予厚望,是一朵寄托幻想的花。“棒打”通过戏剧性的场面表现封建权势的凶残狡诈,是一朵备受搓揉的花。这些爱情之花或悲或喜,或毁灭或灿烂,令人怜悯,令人赞叹,令人扼腕,令人称羨,值得后世借鉴。

参考文献:

- [1] 游国恩,王 起,等.中国文学史(四)[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10.
- [2] 浅论“三言”的婚恋观[EB/OL].http://www.wenmi114.com/wenmi/lunwen/biyelunwen/2007-07-24/20070724108389_2.html.
- [3] 王 鹰.从文学作品看古今爱情观[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8(8).
- [4]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60.
- [5] 陈文新,余来明,周柳燕.明清小说名著导读[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211.
- [6] 啸 马.中国古典小说人物审美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66-67.

[责任编辑:杨 勇]

(上接第44页)

- [3] 李宗植.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9:274-275.
- [4] 张秀生.中部地区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9:8.
- [5] 汪受宽.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反思(上册)[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312.
- [6] 储成仿.新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重大转折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209-210.
- [7] 王海达,刘俊颖,蔡柳丽.“三线”构架重庆现代工业[N].重庆日报,2005-12-27.
- [8] 马述林,田 姝.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J].红岩春秋,2007(2).
- [9] 唐泽江.论大西南战略地位及其开发[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106.
- [10] 国防科技工业志编纂委员会,重庆市地方志总编辑室.重庆市志·国防科技工业志[M].重庆:重庆市经济委员会,1996:256-257.
- [11] 俞荣根,张凤琦.当代重庆简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227.
- [12] 方大浩,韩渝辉.建国以来重庆经济大事记[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311-312.
- [13] 重庆市统计局.重庆建设四十年.基本建设投资额、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图表[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
- [14] 重庆市机械工业志编纂领导小组.重庆市机械工业志[M].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301.
- [15] 重庆市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重庆市建筑管理局.重庆建筑志[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97:19.
- [16] 杨涛等.西部大开发[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88.
- [17] “三线建设”在重庆.中央政府门户网站[EB/OL]. [2007-06-18]. www.gov.cn.
- [1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高湘泽“三线建设与重庆机械工业的发展”[M]//重庆文史资料第四十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36.
- [19] 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重庆市科学技术志[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494,499-504.
- [20] 重庆市人民防空办公室.重庆市防空志[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234.
- [21] 夏述华.涪陵港史[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1:135.
- [22] 重庆市机械工业志编纂领导小组.重庆市机械工业志[M].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302.
- [23] 姚开建.改变中国:中国的十个五年计划[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127.
- [24] 涪陵辞典编纂委员会.涪陵辞典[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193.
- [25] 刘常琼.三线精神永放光芒[EB/OL]. [2009-03-21]. <http://www.tltvu.net.cn/index.php/thread/view/id-9642>.
- [26] 《青红》剧组疲态尽显[N].重庆时报,2005-06-10.
- [27] 向 军,贺怀湘.中梁山有个上海村[N].重庆晚报,2009-01-16.

[责任编辑:刘自兵]